

NEW POETRY REVIEW



2006年 第1辑
总第三辑

观察与言论

是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海甸来信：谈杨键及新诗语言的本土化 田一坡

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 周 瑾

新诗史研究

“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 姜 涛

“现代文化的荒原”，T.S.艾略特，现代主义，中国新诗 张松建

“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诗歌运动 李润霞

问题与事件

什么是世界诗歌？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著 / 洪越译、田晓菲校

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 /

洪越译、田晓菲校

诗人研究

“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

——长诗《哈拉库图》与诗人昌耀的精神历程 易 彬

梦想导游论夏宇 陈义芝

新诗评论

穆旦专辑

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段从宇

1967年穆旦的短暂“重现” 胡续冬

重读、重述抑或“重估”

——关于穆旦和穆旦研究的札记 王 璞

访 谈

未曾停驻的人生追求

——绿原访谈录 姜 涛

诗与生命交相辉映

——蔡其矫访谈录 伍明春

翻译与接受

绿色的词语：约翰·克莱尔 [美]海伦·文德勒著 / 王牧译

本辑著者、译者简介

编后记

25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第1辑



新诗评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总第三辑)/洪子诚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301-10623-8

I. 新… II. 洪… III. 新诗-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4688 号

书 名: 新诗评论 2006 年第 1 辑(总第三辑)
主 编: 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本 辑 编 辑: 张桃洲
责 任 编 辑: 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10623-8/I·080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25 印张 25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观察与言论

是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 [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3)

海甸来信:谈杨键及新诗语言的本土化..... 田一坡(27)

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 周 瓚(38)

新诗史研究

“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 姜 涛(53)

“现代文化的荒原”:T.S. 艾略特、现代主义、中国新诗... 张松建(70)

“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诗歌运动..... 李润霞(98)

问题与事件

什么是世界诗歌?.....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

洪越 译、田晓菲 校(117)

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

洪越 译、田晓菲 校(129)

诗人研究

“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

——长诗《哈拉库图》与诗人昌耀的精神历程..... 易 彬(149)

梦想导游论夏宇..... 陈义芝(159)

穆旦专辑

- 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段从学 (175)
- 1957 年穆旦的短暂“重现” 胡续冬 (181)
- 重读、重述抑或“重估”
——关于穆旦和穆旦研究的札记 王 璞 (191)

访 谈

- 未曾停驻的人生追求
——绿原访谈录 姜 涛 (201)
- 诗与生命交相辉映
——蔡其矫访谈录 伍明春 (224)

翻译与接受

- 绿色的词语: 约翰·克莱尔 [美] 海伦·文德勒著/王敖译 (243)

本辑著者、译者简介 (266)

编后记 (269)

观察与言论

[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是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田一坡:海甸来信:谈杨键及新诗语言的本土化

周瓛: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

是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

[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应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的要求,本文上半部分略说西方对中国新诗的了解,下半部分略说鄙人最近所做的研究,主要针对当代中国大陆先锋诗文、诗人的性质与其社会身份的互动。

有许多广义和狭义的“中国”,比如文化中国(广)和当代中国大陆(狭)。“国内”同样有多种解释。用这两个概念时,本文主要依靠上下文,并未处处加以明确的解释。

是何种中华性?

有无数按照地理、语言、文化、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建设的团体在惯常话语中都属于“西方”,但其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区别。拿纽约与伦敦的英语诗坛相比,和拿纽约或伦敦与昆明或广州的中文诗坛相比,前一组之间可能更加接近,但纽约与伦敦的诗坛并非一回事,波兰、意大利、新西兰又并非一回事。而且,世界上的人、语言以及文本日益增多的易动性,也进一步加速了多元化的过程。既用日语又用德语写作的日籍德国移民的日本女诗人多和田叶子属于西方吗?中国土生土长的,既在北大又在加州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在北美一座高校讲课而又“回国”开会的学者黄亦兵呢?同时出版作者与译者几乎

* 本文是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柯雷教授(Maghiel van Crevel)在2005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

重叠的双语集子诗人麦芒呢？西方仍然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内学术界仍然看得到一种叫做西方的东西，仍然把它建构成中国与西方互相作为他者的二元对比的一面。此情况是有历史背景的，西方在翻译中失去其内在的差异性并非惊人之事。相反亦然：内在多元的中国（在此指文化中国）在西方眼光中，常常遭受过度的同质化，而这不仅仅是外行之罪。那么，西方在哪里？

至于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对在任何意义上所谓的代表性都要持怀疑态度。先不说西方，就我校以前写过或正在写关于中国新诗的博士论文的学者而言，连这种小小的本土或本校传统，我也不敢代表。此外，本文必然反映出本人是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大陆先锋诗歌的，换言之，我对许多其他种“中国新诗”的了解较为浅薄。

同样重要的是，在文化中国的不同地区与不同学术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区别。再者，日本和韩国都有悠久强大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传统，这又是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外国”对中国新诗的研究的表现，好在本次大会有好几位日本、韩国学者参加。

虽然以上描述带有保留之心，本文还是试图提供一些想法，即使只是为了促进大家重新考虑像“西方”和“中国”那种过于笼统的范畴。在洛杉矶与北京、在西方与中国，或在西欧与东亚研究中国新诗的方式之间，以前很明显的界限有不少已为近几十年学术界的全球化所擦掉了，或至少变得模糊到快失效的地步。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拒绝最近流行的，声称“一切都是全球，一切又是本土”那种说法，或许确实能找到一些有趣的西方与中国的新旧不同处。本次会议也许能够阐明的一个问题是中华性现象。像文科中的其他概念一样（比如诗，又比如美），中华性这个概念可以让人琢磨一辈子，因为琢磨者自己就是给予它意义和力量、使它形成的因素之一。在座的许多人或所有人都用各种方式谈到过中华性，但既是因为学术内在发展，又是因为大气候的全球化倾向，中华性有可能在今日具有前所未有的易变性。

资料的分类

在西方的高校课程、学术论文、文学出版物上能看到的中国新诗是

一套或几套经典化的资料。成功率或流行率的高低之分意义上的经典化,无所不在,从最“高雅”的到最“通俗”的各种文化生产一律如此。中国新诗经典在西方比在国内的“淘汰率”要高;换言之,能获得经典身份的作品要少。原因很简单,即经典的空间小。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或在汉学课程中还是在一般书店的书架上,中国新诗都只能占领较小的领域。一来,在重点学校,比较文学要容纳许多语言、文化、民族的传统,汉学又要容纳许多不同学科(*disciplines*),比如古今的哲学和思想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史与物质文化研究、文学、戏剧学与电影学等。二来,在西方的中文资料,即诗歌本身以及各种相关文本,从诗歌流派的宣言到学术论文,至今仍然很有限。而且,跟汉语为母语者比,外语为母语者阅读、消化中文资料的速度慢。新诗的西语译文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后面的问题,同时给学汉语的人加上更多的欣赏者。但显而易见,任何文学的学术研究,不管牵涉几种语言,从原文入手还是最理想的。

西方的中国新诗经典是如何形成的?既是在学院,又是通过针对广泛读者的翻译工作。首先,作为第一个阶段,国内的经典化起着关键的作用。有国内经典提供的原料,才可能有在国外的第二阶段。后者的结果不能超过上述的小小的空间。最后容纳哪些作者和作品,主要由专家的选择决定,即设计学院课程的学者和广义文坛上的文学代理人以及翻译家。专家并不是经常把未入国内经典的资料直接输入第二阶段。但这种事情也存在,并不像以前那么罕见,因为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所以,本文中的“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严格来讲,意味着“在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或“用西语发表关于中国新诗的学术论文”,翻译界也一模一样。而且跟过去比,外国人在近几十年更有机会长期住在中国国内,亲身体会广义的中国及其各种具体的表现。从国内到西方,或是说在经典化的两个阶段之间,上述高低之分还经常发生变化。系统地指出变化中的规律或典型有待进一步研究,得考虑国内和西方对于中华性的各种理解。无论如何,经典化的第二阶段并非简单接受国内经典最高的百分之几或十分之几。诗人和诗文在国内的成功率或流行率未必能预告其在西方的相对身份。拿当

代大陆诗歌来说,诗人海子能引起西方读众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作为文化现象,即作为已神话化的诗歌“烈士”,或更准确地说,作为产生这种神话化的广泛诗观的一例。当然,海子神话在国内不是没有争议性的。反过来讲,来自广西的女诗人琼柳在国内没多大名气,但80年代末在荷兰,其作品发表于几家一流文学刊物上,还入选一家大出版社出的多人中国当代诗选,此书中包括食指、北岛、顾城、杨炼、王家新、雪迪这些响亮的名字;也有一家很小的,业余而绝对高雅的出版社给琼柳出了一个只有一套五首的组诗的漂漂亮亮的双语小册子。琼柳当时还举办过好几次个人朗诵会、翻译讨论会、公开采访等。能说明此案例的主要因素,在于对各种外文学有深刻兴趣及了解的荷兰诗人 Rein Bloem 对琼柳的作品评价极高,与当地汉学家的合作也极顺。

以上一段只是强调经典化现象的重要性。学院和出版社供应的任何一套作者或作品都不是天然的或理所当然的。

下面提到一些在西方工作的学者和翻译家的名字,但并没有提供完全的名单之意。一来,本人远远没有把握所有“西语”中有关中国新诗的著作;二来,以下人名在此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例子而已,大家感兴趣的活可以找个别需要的资料。还有,在学术与翻译等几种不同的文本种类中均有贡献的同事的名字不一定每次都重复。每位学者和翻译家第一次提名时,使用其在西方发表作品时使用的外文名字,给来自中国的同事接着用中文名字。

至于西方对于中国新诗的分类方法,视野最广的 Michelle Yeh / 奚密已指出,传统上的地缘政治性界限本身不足以达到对于新诗的综合性看法,甚至还会有歪曲效应,跟 David Der-wei Wang / 王德威在小说研究界所坚持的一样。然而,在西方(在国内也是)那种界限至今仍然常用,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总之,在此方面,西方的学术论文和译文使用各种不同大小的框架,包括新诗的全部传统(比如奚密,尽管在她的著作中,毛泽东时代的官方作品可以说有异体身份;她对这点有明确的论述);20世纪中国大陆(比如 Zhang Zao / 张枣,跟奚密一样,基本上不谈毛泽东时代的官方作品);“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即1911年至1949年(比如 Kai-yu Hsu / 许芥昱、Wai-lim Yip / 叶维廉、Julia Lin / 茱

之颖、Leo Ou-fan Lee / 李欧梵、Jiayan Mi / 米佳燕);中国香港(比如 PK Leung / 梁秉钧);中国台湾(比如叶维廉、Dominic Cheung / 张错、Lisa Lai-ming Wong / 黄丽明、奚密与 Göran Malmqvist;后二位合编的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一书也包括中国台湾 20 世纪 20 到 40 年代的中文现代诗);中国大陆(比如许芥昱、Maghiel van Crevel、Yang Xiaobin / 杨小滨、Julia Lovell)。当然,这些范畴内部又有不同种类,经常也还是地缘政治性的,或至少政治性的。比如民国时期的战争年代、中国台湾的乡土运动、中国大陆的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期(二者的对比和朦胧诗的崛起纷纷产生了许多论文,William Tay / 郑树森为较早的一例)、国民党 40 年代末迁到台湾对于散居或流亡诗歌的关键时刻等。如果给个人和多人在刊物和书上发表诗歌作品的西语译文装上地缘政治性或纯政治性的框架,就可能产生过度政治化的效果,几乎把文学再现成政治的副产品或对于政治的反映而已(比如 Donald Finkel 和 Carolyn Kizer、Tony Barnstone 在英语选本序中的语调)。对于大部分中国新诗来说,有文本上的证据可证明这种政治化是不准确的。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好是这些作者或编辑在自己的文章中最大声地指控国内政治在某些地点某些时间对于文学的压抑。

然而,仅几十年,在西方,不少研究者也开始把各种不同潮流或流派的划分法用做分类标准。就像上述的地缘政治性标准那样,在这一方面,国内国外的相同处十分清楚。这种或许更加是文学内在的标准包括文艺审美、历史背景、国内地理(比喻的和字面意义的)、作者的(社会)性别、文化生产与发表的媒体等。能举的例子极其多,本文只提现代主义的不同种类与时段(比如 Michelle Loi、Harry Kaplan、Gregory Lee、Jin Siyan / 金丝燕、Paul Manfredi、Jacob Edmond);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 John Crespi);女性诗歌、(社会)性别及相关问题(比如 Julia Lin、Wendy Larson、Jeanne Hong Zhang / 张晓红、Jennifer Feeley);本土诗坛,像南京诗坛、“南方诗歌”、四川诗坛(比如 Jeffrey Twitchell-Waas & Huang Fan / 黄凡、Raffael Keller、Michael Day);网络诗歌(比如 Michel Hockx、Michael Day)。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以及给一般读者的介绍还有极其重要的一个范畴,即对于个别的作者和作品的个案研究,包括几页的

文章和几百页的书、个人集子和多人诗选、各地诗歌节的小册子等(比如,大致按各位著作问世的时间次序,但在上文已提到的名字不重复,而作为在“西方”的,对中国新诗研究和翻译有贡献的人物的名单,这还远远不止:Harold Acton 和 Chen Shih-hsiang / 陈世骧、Robert Payne、Angela Palandri、Kenneth Rexroth 和 Ling Chung / 钟玲、Andrew Parkin、Lloyd Haft、Bonnie McDougall、Geremie Barmé、John Minford、Séan Golden、Pang Bing-jun / 庞秉钧、Shiu-Pang Almberg / 吴兆朋、Chantal Chen-Andro、Claudia Pozzana、Alessandro Russo、Lü Yuan / 绿原和 Winfried Woesler、Joseph Allen、Edward Morin、Chen Maiping / 陈迈平、Tang Chao / 汤潮和 Lee Robinson、Wolfgang Kubin、John Balcom、Peter Hoffmann、David Hinton 和 Yanbing Chen / 陈彦冰、Eva Hung / 孔慧怡、Gordon Osing 和 De-an Wi Swihart / 吴德安、Henry Zhao / 赵毅衡和 David Pollard、Simon Patton、Jan De Meyer、Giusi Tamburello、Paola Vanzo、Brian Holton、Steve Bradbury、Tao Naikan / 陶乃侃、Li Xia / 李侠、Wang Ping / 王屏、Silvia Marijnissen、Keith Waldrop、Frank Stewart 和 Arthur Sze、Eliot Weinberger 和 Iona Man-Cheong / 文朵莲、Andrew Emerson、Cosima Bruno、Sidse Laugesen)。

视角、理论、方法

资料的分类与视角、理论、方法不可分开,女性诗歌为突出一例。令人注意的是,跟资料的分类相比,视角、理论、方法方面并没有跟着国内的模型走。其实,近年国内的学术工作显示出,这方面的“内外”关系刚好相反,尽管“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界限已模糊化,但也还是如此。西方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德里达(Derrida),对国内学术界的影响比中国文学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大。这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的中国新诗研究者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当然,与研究其他文明或语言的诗歌的专家比,他们要重视这些理论,而且也考虑到其留在现代中国文学上的踪迹。

大致说来,西方对中国新诗的研究采取好几种不同的视角,包括对以下概念的研究:

- (甲)诗歌作品:作为自足性的、“纯”文学性的文本,无需依靠诗人传记或大气候的历史语境。
- (乙)诗歌作品:作为文学性文本,即本身能够引起考察(动机有多种,得看个别读者赞成的文学观,比如“诗言志”,或“文以载道”,或在讲“内容”之前先使读者注意“形式”或语言本身的某种用法),但同时(也是同样重要地)反映本土社会经济方面或文化方面的历史情况;诗歌作品甚至可以作为纯粹的历史纪录证据,已不仅作为文学性文本。
- (丙)诗坛各方面。
- (丁)诗话、诗学、诗观,既是明确的又是含蓄的;包括“诗人观”,即对诗人性质和身份的看法。

以上四种视角并非互相排斥的,反而经常在个别学者的著作中汇合,又能容纳许多(1)不同的理论以及(2)相关方法。举几个例子:(1)版本学、语言分析、接受审美与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文学的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研究、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散居研究和流亡研究、翻译研究、朗诵研究等;(2)各种各样的方法,从朗诵现场录音和建设在线的“网站馆”(即,下载和系统地保存关于中国新诗的国内外网站,比如海德堡大学与莱顿大学合办的 Digital Archive for Chinese Studies / 汉学在线档案,网上搜索“DACHS”,选“Poetry”)到分析诗歌作品的重音节奏和细读的其他种类。

本人近年采取的一种粗糙的分法是文本、上下文或语境、元文。文本(text)指诗歌作品本身,上下文或语境(context)指文本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元文(metatext)指关于诗歌的话语。此分法能够说明,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新诗绝对是多方面的。但又不一定已达到平衡,或许需要特别鼓励和促进其组成部分中的一种或几种。希望本次会议在此方面能有帮助,不但是对国外学术界,而且也是对国内学术界。

近年倾向

西方对中国新诗研究的近年倾向这一话题令人想起两条词汇,即学科化(disciplinarization)和理论化(theorization)。尤其是在二战后,对于所谓“非西方”的各个地方的文学、历史、政治、宗教等的研究已不限于韩文系、日文系、中文系之类的地域型机构(“非西方”一概念当然有巨大问题,但这在本文讨论范围以外)。像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艺术史之类的学科型的院系其实仍然未能摆脱不同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此问题不但表现在能够进入其视野的资料中,在声称它具有“普遍”价值的各种理论框架中也含蓄地继续存在着。但不容置疑,“学科型”院系对于非西方世界各个地方的兴趣和了解有所提高。结果,既是非西方文学的西语译者,又是了解原文资料但属于学科型机构的“地域专家”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学科型机构在此可指比较文学系,也可指跨学科和地域之间界限的其他的机构化的合作形式。

因此,从19世纪传统上的考证(philology)与“翻译性学术”开始,对非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已彻底多元化(请见上述视角、理论、方法等问题)。对非西方文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把它通过(字面意义的)翻译提供给西方的读众。一个人未受过原文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高级教育,便不可能完成广义上可靠的译文。这种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又不能够同时也花在学科型理论的训练等问题上。地域型院系在理论方面的要求没有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之类的学科型机构高,但对中国新诗的研究要是没有最起码的明确理论框架,便不符合今日西方的学术标准。

问题关键

何谓“中国新诗”?

当时与会者请回忆一下1997年在武夷山的“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和2001年在香山的“中国新诗理论国际研讨会”。二次大会均发生过关于以上问题的激烈讨论,比如“汉”指“汉族”,还是指“汉语”呢?后

者提供对“现代汉诗”的明确解释,即“汉语现代诗”(在此不谈现代主义,与“现代”概念不同),也提供对以上的大问题一清二楚的、略有技术性的回答。说我们平常称之为中国新诗的东西是汉语现代诗或中文现代诗,本身很有道理。此说法反映的诗观或对于诗歌的定义是最重视语言问题的,更准确地说:个别语言的问题,把中国新诗的诗性与作为个别的语言的中文连在一起。同时,在久为人所知的诗歌可译性大讨论中,这种诗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观的看法,原因之一是该讨论中的话题经常为保守意义上的、狭窄意义上的翻译。

请大家临时假设,西方的学者从上面的定义和其一切含义出发,即,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客体视做中文现代诗,又觉得此研究客体的学术合法性来自资料的个别语言认同。没错,人这个动物有一种不知为何着迷一门或几门外语,然后无法抗拒该语诗歌的诱惑。然而,以上假设虽然不是错误的,但根本不足以说明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无疑意识到了“中国新诗”这一词条在定义上的复杂性,但并不是我们的每篇论文都反映这种意识。此论点起源在于我们常常心照不宣地,也可能是无意识地,把可译性视为当然之事。这是我们发表文章不可缺少的根本条件,学术论文和文学性译文均是如此。是的,在序跋中、注解中,还有在我们的论文的正文中,我们偶尔主动自问译文“忠”于原文与否(凡是对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中翻译这一概念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忠”和“原文”均是极其可疑的、带争议性的标准,但此问题也在本文讨论范围以外)。然而,公开自问有时候只不过是走形式,比如说,承认翻译押韵的问题:即,因为个别语言中语义和语音的关系非常系统,所以押韵不可能直译,除非是巧合。举跟当代诗歌有关的一例,英语的 the system(即先锋诗歌语境中“官方”的等同语)、the market、the west 三条词汇没有押韵,但中文的“官方”、“市场”、“西方”却有。要么,自问几乎不超过对于某词某句在原文中本土的历史、文化、审美含义的特别阐释。下面一例,也跟当代诗歌有关:中文的“朦胧”,英语译文有 misty、obscure、opaque、vague、hermetic 等,还有 menglong,走的是一条由汉语拼音提供的很方便又很不满意的出路。

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当然对简单化的翻译概念持

怀疑态度(比如 Lydia Liu / 刘禾、Simon Patton、李典、Brian Holton、王屏、Huang Yunte / 黄运特、Paul Manfredi)。反过来讲,把诗性与某门个别的语言连在一起当然也未必意味着,文本便不可译成任何其他语言。但无论如何,我们用各种渠道发表中国新诗的丹麦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挪威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译文,也在学术论文中引用这些译文,还希望读不到原文的比较文学家也引用:这一切都显示了一种广泛的,对于可译性的基本信仰。这使以上的假设不足以说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动机,也不足以说明我们的诗观以及相关的,对于自己的研究客体的学术合法性的看法。说我们研究中国新诗是因为它是中文的,简直是不够的,也不会使任何编辑自动接受我们的译文和论文。

这种情况在俄亥俄州大学的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为科罗拉多州大学的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现代文学》续刊)、岭南大学的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现代中文文学学报》之类的专业学术刊物,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 *Renditions* /《译丛》、荷兰比利时汉学家合作办的 *Het trage vuur* /《文火》之类的专业中外文学翻译刊物所创造的空间里,也许能够称得上例外。但先不说我们学术和翻译本身的水平,虽然原文资料的语言认同是这些刊物创刊的一个基本考虑,但是编辑还会问的,我们的稿子为何值得发表呢?粗略地归纳,在这种始终集中于中文资料的语境当中,我们回答编辑的问题需要依靠两种东西。要么,有另外一种或几种非语言的中华性,能够用外语重新讲述,或许对于这些外语所属于的其他文化是新鲜的;要么,是学科性的,或“纯文学性的”价值。当然,“纯文学性”不存在,但不妨我们把它用做一条渐近线。

不限制于或不集中于一定地域或语言的刊物也有助于说明情况。在它们那里,任何中华性都未必算数。换言之,中华性并非其标准,尽管也许至今尚未有过其他学者研究过该论文或译文所阐明的中国文化特点。其实,在所谓纯学科性刊物常见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哪怕是无意识的)使编辑和评审员有时过多地要求用在汉学中常识的地域性“上下文”来补充主要论点。而这点,没准又会导致“例外